

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进展、挑战与方向

杨艳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1)

摘 要 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应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新时代; 史学理论研究; 实践成就; 话语体系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3.02.005

史学理论探讨的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涉及历史学深层次、宏观性的内容,在历史学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史学界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①的思路,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居于重要位置。总结梳理新时代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实践成就和特点,对于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面貌、趋势与特点

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向不断前进,在传统史学遗产的发掘梳理、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中国本土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历史认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研究重点和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传统史学遗产的发掘梳理取得新进展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史学遗产。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十分重视对传统史学遗产的发掘和梳理工作,新时代以来,学界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传统史学理论遗产的

作者简介: 杨艳秋,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十四五”规划项目“(新编)中国通史·史学史卷”。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 页。

研究分析,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等问题^①,并对中外史学的异同进行了系统比较^②。肯定中国传统史学遗产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二) 唯物史观研究取得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持续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工作,通过现代哲学、科技、考古等知识反观唯物史观,论证其科学性^③,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主要表现为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得到进一步强调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的结合。

文本研究与概念史研究是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内涵及其基本原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对文本的考察沿袭了相关研究自21世纪以来形成的实证风格,即以某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中心,考察其在唯物史观产生和发展历程中的作用^④。学术界意识到,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难免存在理解上的简单化倾向,在一些问题上未能完全把握马克思在相关认识上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偏颇之处,因此,大力提倡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号召史学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并运用于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析,在新时代形成了“重建”“重构”或“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

而由此产生的学术争鸣,例如区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的讨论,更反映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活跃情况。同时,从唯物史观的生成语境入手,探讨唯物史观的具体内涵,以此展开了对唯物史观的始源语境和科学性质的发掘与讨论。史学界以实践观点和人本观点透视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在唯物主义前提下深刻揭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尝试科学地回答人的创造性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相互关系这一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⑤。种种研究,都使得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不断趋向丰富。

(三)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再关注

作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范式,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唯物史观相关研究的深入,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分析逐渐增多,探讨的内容包括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性阐释、“五形态”与“三形态”的进一步论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方面。《史学理论研究》聚焦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编发了一组文章,澄清了中国早期社会性质方面的许多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则聚焦于中国古代有无奴隶社会这一问题,组织了一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再研究”笔谈。相关研究聚焦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生成和再阐释,或对马克思有关西欧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内涵、适用范围及其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考察,或对“五大社会形态”进行再阐释。此外,学界还对马克思所论述的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固有特征与特殊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阐明,提出了构建唯物史观的崭新形态——“东方史观”的主张。总体来看,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再研究的同时,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变迁情况进行了分析,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

①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②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的考析与评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③刘森然:《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多层反思》,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比较典型的是聂锦芳、黄建都等人合著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⑤安启念:《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及其史学价值》,《理论探索》2016年第1期;侯继迎、倪志安:《实证·总体·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三题》,《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王让新、李弦:《“现实的人”的理论跃迁: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解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代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证明了唯物史观蓬勃的学术生命力和解释力,这将是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四) 构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体系形成强劲思潮

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学界广泛共识。对历史学研究来说,尽快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史学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历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主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在宏观上,逐步形成符合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的清晰脉络和整体框架;在微观上,对术语、概念、范畴等作细致分析和谨慎抉择,探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建设之路^①。

构建“中国历史哲学”设想的提出,是新时代学术界探索构建中国本土史学理论体系的有益尝试。“中国历史哲学”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考察,包括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矛盾、中国文化精神及文化属性、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等内容,主要任务是要建构中国历史的过程体系,建构一部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②。与此同时,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成为新的呼唤^③。

(五) 历史认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历史学永远需要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保持警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直面历史认识论、知识论等当代世界范围内史学理论的高水平前沿问题。近年来,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不少学者将历史认识论作为深耕领域,部分学术期刊也组织了相关讨论。如《历史研究》于2018年刊发了一组文章,内容涉及阐释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公共阐释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思想史研究领域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等。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将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视为有机整体,而后者否定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随心所欲地解读历史,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的历史阐释学,对于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十分必要。

二、问题与挑战

新时代以来,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布局呈现出新变化,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中国通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外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9个研究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在史学研究领域,诸如中华文明起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等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史学理论学科在观念、方法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展露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国史的其他几个二级学科发展相比较,当前,史学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对弱化

近年来,虽然史学界直面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挑战,站在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进行了现代诠释,取得了一定成绩^④,但总体来看,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层面上的建构还需加强,不少已有研究对

①瞿林东:《理论与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②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④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度、对社会经济形态及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关注还相对缺乏,存在着唯物史观研究的学院化倾向,整体性、贯通性的综合研究还相对欠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中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修养、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等各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二) 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新时代以来,学术界先后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系统总结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新时代以来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五朵金花”问题的大讨论、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理论、吴于廑的整体史观等成为中国学界70多年来,在探索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贡献^①。但与以往相比,近年来,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界目前对史学理论的研究相对较为逊色,对历史理论的研究则相对更为薄弱,主要表现在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长时间缺乏有突破性的成果。可以说,历史理论的相对弱化乃至缺失,已成为制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瓶颈。这也使得在最需要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的时候,历史学可能不能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历史研究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如何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摆脱既往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西方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束缚,取得创新性认识,提炼出富有启发性和解释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和理论,以提升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阐释力、解读力,使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强化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能力,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的新需要,是当前学界加强史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直面的重要挑战。

(三) 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相对不够

讲求“致用”,注重“以史经世”,在埋首著述的同时关注现实社会,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强调努力的方向之一。但长期以来,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鸿沟,一些研究者专注于自身学术领域的探讨,对现实社会缺乏关注,史学理论研究有流于空洞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相关研究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社会实践。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和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史学实践的自觉,当前历史研究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影响研究层次的提升和对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中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史学工作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角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满意回答。

(四) 话语系统的构建和面向世界的能力相对不足

现代中国历史学是在近代西方学科体系传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许多理论和术语引进自西方。尽管学术界一直在强调对传统史学遗产的发掘和整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看来,目前我国本土史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相对不足。众所周知,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有着独特的文明起源和历史道路,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不能盲目套用那些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会导致中国史学自我意识的缺失。由于现有研究多将重点置于对既往史学发展历程的知识性梳理,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尚未将既有史学史研究成果上升为具有理论高度的系统认识和话语体系,同时未能有效借鉴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概念工具,导致当前历史学学科发展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的更新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学理论研究的“高度”和“反思”特质。如何在全球学术研究的思潮激荡中拥有话语主动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①于沛:《批判与建构: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三、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①的重要任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中,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②。应该说,话语体系是复杂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不仅涉及语言的叙述方式,而且承载着一定的思想取向、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在我国的史学研究中居于重要的指导地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内交锋的加剧,唯物史观一度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各种西方社会科学思想、观念,特别是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观点甚嚣尘上,尽管学术界从未放弃过对相关挑战的回应,并一再重申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但要从根本上破除各种西方思想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不良影响,必须建设创新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加强对学科理论、学科概念的建设。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③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是形成中国风格学术体系的理论指导,成体系的学科概念是建立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就是要改变当前部分研究领域内存在的“碎片化”倾向,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壁垒。既要完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历史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也要注重总结、提出具体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注重从长时段、大历史的研究中形成理论性成果;更要注重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关注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问题,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亦步亦趋、盲从崇拜。对待西方的史学理论,需要站在中国史学立场,审视其价值意义。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提高人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的坚定性,才能推动新时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历史发展,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中国历史变迁的实际过程,集中于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将是未来史学理论研究工作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二) 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

历史具有传承性,文化也有其传承。作为中华文化灿烂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传统史学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修史制度和秉笔直书、关怀现实、注重经世的优良传统,出现了司马迁、刘知幾、章学诚等一大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杰出史学家。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④。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健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44页。

②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④《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强调 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康发展、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同样也需要从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这些都要求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

一是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史学传统的阐释和分析。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史学传统是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宝贵资源,也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源泉。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需要注意沟通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积极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并合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优秀成果。

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比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挖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时代撰成了系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建构起史学批评史的研究构架和具体路径^①,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史学理论遗产,推动当代史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是要做好理论概括和研究阐释。通过对传统史学思想的发掘,提炼总结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史学独特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学理论体系。这就需要学术界在对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分析中,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中国史学民族特色、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和方法,并力求作出新概括、新表述,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与独具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传播^②。

(三) 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研究本土化成为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方向性变化。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任务,并强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③,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长期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④,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基本的路径和方向。

过度使用西方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研究范式来分析中国历史问题,缺乏自主性的历史解释体系,是当前中国史学发展亟待克服的弊端之一。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中国历史实际为研究起点,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盲从崇拜,构建起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史学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22年4月,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⑤,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任务,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产生了积极反响,引发了热烈讨论。

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凸显的是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地位,要求学术的继承性和理论的原创性,具体说来,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

①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②陈其泰:《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④《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强调 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⑤《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发掘和整理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建设有中国话语特色、基于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体系,建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则凸显的是中国史学的实践性和时代性,这需要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关注现实,推动学术研究与新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鲜明底色,史学理论研究的最高目标是直面实践、融入时代,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是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动力。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越是社会转型、社会变迁激烈的时期,越是史学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20 世纪 50、60 年代,史学界围绕着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社会发展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对中国的历史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要求史学界关注现实,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作出深层次的理论回应,时代的变革和中国人民历史实践的伟大发展,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课题,史学理论研究者需要直面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进行知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推动中国史学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凸显中国史学的世界价值。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在对中外优秀史学理论遗产的综合研究中,汲取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建立研讨中国历史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国际史学对话中作出科学回应,形成国际学术前沿的相互关照,构建出既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融通古今中外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要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建设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建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当前,在历史学研究的一些具体领域,从中国本位出发开展研究已渐成主流,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史重返故土”的研究热潮,将会在未来若干年内在史学研究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展开。植根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历史所形成的丰富史学积淀,吸收不断深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的理论滋养,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需要朝着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方向,作出更大努力。

四、结语

总体来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未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广大史学研究工作者要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的优秀基因中,创造性地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未来价值的文明观念,并真正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我们思考世界、思考历史和思考时代的有效方式,自觉担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时代使命,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作出不负民族、不负时代的应有贡献。

(责任编辑: 马延炜)